两部门出台行动方案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拟制定鼓励研发重点领域目录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在国家发展大格局中，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角色与路径更加明晰。

日前，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科技部”）下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2022—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3年底，各类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大批中小企业成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创新环境。同时，《行动方案》还提出，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企业加强硬科技创新。

2021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明确提出了提升基础学科研究、前沿科技研发等方面创新能力的一系列目标和要求，同时还对启动实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做出了部署。《行动方案》是落实《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的配套政策。

硬科技创新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对智能交通领域芯片研发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是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的储备。在总体控制招聘数量的背景下，我们还增加了不少这一领域的研发岗位。”

《行动方案》明确了一系列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设计，包括“建立企业家科技创新咨询座谈会议制度”“制定国家鼓励企业研发的重点领域指导目录”“支持中央企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行动方案》提出“支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企业加强硬科技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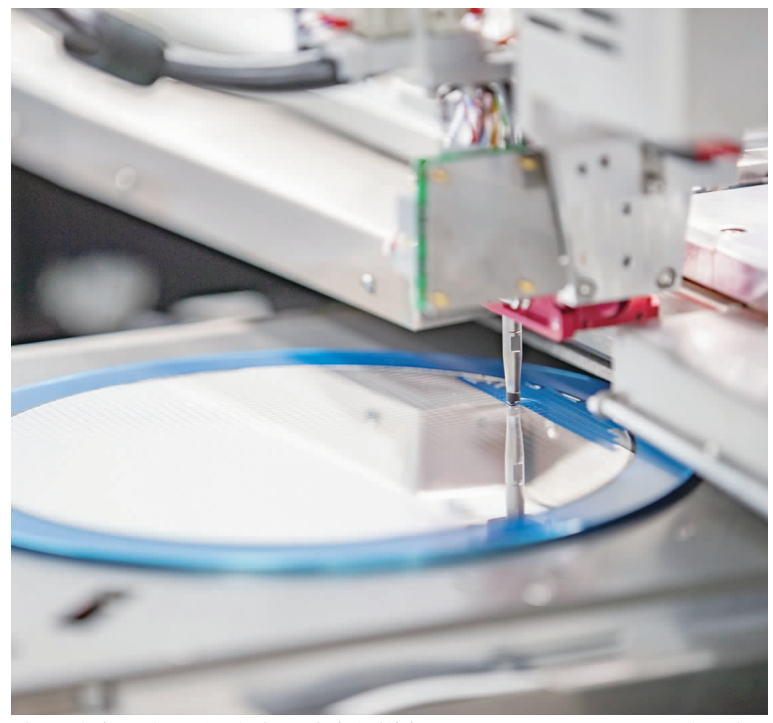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对智能交通领域芯片研发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是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专业人才的储备。在总体控制招聘数量的背景下，我们还增加了不少这一领域的研发岗位。”8月17日，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管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十分希望企业更深融入国家科技发展的大格局。”

依托中国庞大的市场体量，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它们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对传统行业领域进行“互联网化”的改造，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收益。

但是，平台经济企业主要依靠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也受到诟病。202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规范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发展。此后，一些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开始在“硬科技”研发和创新领域加大投入，期望取得成效。

2022年7月，小米创始人雷军宣布，小米拟捐赠5亿元成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等领域基础研究。近年来，百度也与清华大学开展科研合作，支持的重点同样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科技企业与高校合作进行研究和研发，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企业不仅能提供资金支持，更清楚市场需求，可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一位常年参与校企联合科研工作的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同，硬科技创新能够提升社会总福祉，而不仅是利润在不同行业领域之间转移。”



到2023年底，一批骨干企业将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新华社/图

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强化研发的态势已经显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指出，我国互联网企业更加注重创新，2017年到2021年，上市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增长227%。

体制机制保障

对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开展研究研发的资金投入，若能划入税收减免的范围，这会鼓励企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企业和平台经济企业加大与高校、院所合作科研的力度，提升校企合作的效率，达到更好的效果。

政府近年来十分重视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作用。2022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创新不问出身，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大家在创新方面都是一视同仁的，都有同样的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

《行动方案》更为细致地规划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机制、路径和方式，如支持中央企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对于企业牵头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强化以创新联合体方式组织实施。

“在科研领域，一些中央企业有比较好的基础和传统，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在前沿技术方面有自己敏锐的触觉和独特的智力优势，两者互补，可以达成更好的效果，以创新联合体的形式进行研发是好的，同时，也需要在知识产权分享、市场转化收益方面做好配套机制设计，让所有参与研发的主体都能够合理分享收益，这项好的机制才能落实。”前述多年参与校企联合科研的资深人士表示。

前述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的高管表示，对于“创新联合体”这一形式，他和自己供职的企业都是支持的，但关键在于能够找到契合双方的“项目切口”，而这一项目又为国家提升创新能力所急需。“这样，政府有动力支持，双方有兴趣参与，形成合力。”他说。

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人士都向记者反映，虽然本企业有融入国家科技发展大局的意愿，但并不清楚国家具体工作重点，如能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企业战略投入方向与国家科技发展大局更为匹配。

财政部和科技部正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行动方案》提出，制定国家鼓励企业研发的重点领域指导目录，引导企业围绕国家需求开展技术创新。国家科技计划中产业应用目标明确的项目，鼓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同时，国家还将建立企业家科技创新咨询座谈会议制度，定期组织沟通交流，开展问计咨询。构建企业创新高端智库网络，引导支持企业提升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能力。加大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面向企业的宣贯力度。

“我还是希望政策上能够更务实、创新，例如，对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开展研究研发的资金投入，若能划入税收减免的范围，这会鼓励企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企业和平台经济企业加大与高校、院所合作科研的力度，提升校企合作的效率，达到更好的效果。”前述多年参与校企联合科研的资深人士表示。

满足个性化需求 全电发票“特定业务”上线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随着“专票电子化”政策的推进，各地也在探索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以下简称“全电发票”）的个性化需求。

近日，广东省、北京市、湖北省、湖南省等地相继发布了《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常见问题即问即答》，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为从事特定行业、经营特殊商品服务及特定应用场景业务（以下简称“特定业务”）的纳税人开具个性化需求的发票。

目前，这些特定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稀土、卷烟、建筑服务、旅客运输服务、货物运输服务、不动产销售、不动产经营租赁、农产品收购、光伏收购、代收车船税、自产农产品销售、差额征税等。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纳税人在开具全电发票时，可以按照实际业务开展情况，选择特定业务。“根据政策要求，特定业务的全电发票票面按照特定内容展示相应信息，同时票面左上角展示该业务类型的字样。”该负责人说。

据悉，在已经试点全电发票的省份，税务机关会根据现行发票开具的有关规定和特定业务的场景，在全电发票中设计相应的特定内容，这极大方便了纳税人的开票办理。

截至目前，全电发票试点地区已经增加至10个。从纳税人反馈消息看，试点以来，全电发票因无需领用、开具便捷、信息集成、节约成本等特点，受到市场关注。

中科迅联联合创始人、COO陈玉刚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票电子化改革作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突破口，不仅推动了发票载体的电子化，也是实现“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转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发展。

而作为落实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的重要抓手，全电发票的推广可以进一步强化发票记录交易信息的本质，实现经济交易信息“一票式”集成。

“于企业而言，发票管理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开票、收票本身，需要企业以发票为切入点，真正触达企业税务智能转型及管理提升等方面。”陈玉刚说。

记者了解到，实践中，企业常常由于对发票电子化改革与企业管理模式、业务流程、系统等内容缺乏全面的认识，从而造成发票数字化建设成效达不到预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玉刚建议，集团型企业的税务管理数字化改造，应站在“集团一户式”的管理视野，搭建“双动风控机制”自纠自查机制，充分发挥税务数据对业务的管理价值。

在市场人士看来，当前数字化转型已被众多企业上升到战略层级高度。而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序列里，税务数字化转型也成为关键所在。

对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也相继发布政策文件，分别从不同层面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推进财务管理转型升级等内容做出明确要求。

一位税务人士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纳税人经营信息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使税务机关获取相关信息的难度增加。一旦信息采集不全面，就会出现数据信息不能有效利用的情况，这会阻碍税收数字化的进程。

在中国企业财务管理创新与发展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何杨表示，当前数字化税收征管正在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从发展现状看，我国企业面临着全球税收管理的巨大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平台经济长臂管辖、企业合规和反避税力度的加强等内容，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在国际税收管理方面亟待走向数智化。”何杨说。在她看来，经济数字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税收征管的底层逻辑，这使得税收征管的标准、方法等内容也需要重塑与创新。

在此背景下，全电发票的推广，不仅在开票流程、设备管理等方面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帮助财税人员从低价值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整体看，全电发票的试点，为企业财税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保障，同时为企业财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打下了基础。”陈玉刚说。

央行召开信贷形势座谈会 强调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稳定性

本报记者 吴婧 上海报道

2022年8月22日，央行召开部分金融机构座谈会，分析研究当前货币信贷形势，部署推进当前和下一阶段货币信贷工作。这是央行2021年下半年以来召开的第四次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前三次分别是在2021年8月23日、2021年12月16日以及2022年5月23日。

在国盛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杨业伟看来，一年之内密集召开四次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座谈会在央行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之所以这么密集地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座谈会，一方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经济持续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下信贷需求不足，而货币政策有稳经济保就业的职能；另一方面，金融系统也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用实际行动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尤其是本次座谈会的召开，在分析研究货币信贷形势基础上，增加了“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表述，杨业伟认为，这是年中政治局会议，以及7月、8月李克强总理的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政策定调的延续。

一位券商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目前各类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负债端，银行作为经济最主要负债端受到较多关注，也必然承受较大压力。

发力“稳信贷”

7月金融数据显示信贷需求显著偏弱。在杨业伟看来，这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足。而从8月票据利率数据来看，到目前为止，8月信贷数据尚无明显改观，甚至票据利率低于7月，显示信贷压力甚至有所上升。偏弱的信贷目前已经是宏观层面的共识。

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但仍有小幅波动。当前正处于经济回稳最吃劲的节点，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金融系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感，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将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认为，政策层面维稳信用供给的决心和努力显而易见，但信用扩张面临的需求约束和结构变迁也依旧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强调，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要强化宏观思维，充分发挥带头和支柱作用，保持贷款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事实上，在稳信贷过程中，国有大行一般会被要求发挥头雁作用。今年1～7月，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14.4万亿元，同比多增0.5万亿元，增量同比增速3.8%。其中，全国性大型银行（四大行+国开行、邮储和交行）新增贷款投放8.0万亿元，同比多增约1.8万亿元，增量同比增速29.2%；四大行新增贷款投放6.3万亿元，同比多增1.5万亿元，增量同比增速31.8%；中小银行新增贷款投放6.8万亿元，同比少增约0.8万亿元，增量同比增速-10.3%。

倪军认为，从数据可以看出，今年前7个月，信贷增量同比多增全部由全国性大行贡献，体现了大型银行的带头和支柱作用。而非全国性大行前7个月新增信贷同比负增长，对整体信贷稳定形成拖累，背后主要还是中小银行数量多，经营方差大，政策部门的稳信贷政策在中小金融机构端发力有限，导致中小金融机构信贷扩张对市场化信贷需求更加敏感，可以看到中小银行整体信贷增量乏力。

不过，本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增加对实体经济贷款投放，进一步做好对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工作。要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要依法合规加大对平台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政策性开发性银行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对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相关项目的支持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并带动贷款投放。

短期信贷或出现扩张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央行、银保监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支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主要金融机构主动担当作为，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力支持了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

在杨业伟看来，过去3次座谈会经验表明，信贷在座谈会后次月会有所回升，即政策压力之下，短期信贷会出现扩张，但政策的阶段性发力也造成了信贷月度数据的较大波动。具体而言，截至2021年8月央行召开座谈会之前，新增信贷延续下滑趋势。而7月新增贷款规模下滑至当时的年内低点1.08万亿元，并且当月经济数据显示压力有所增大，投资需求回落明显。在这一金融经济偏弱背景下，央行召开座谈会，指出“要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随后8月、9月的新增贷款就有触底扩张态势，但是脉冲之后，随即10月、11月新增信贷又大幅下滑，创下2021年年内新低，12月央行再次召开座谈会，指出经济“面临短期下行压力”，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态势”，随后2022年1月新增信贷达到3.98万亿元，创近期历史新高，同比新增也达到了4000亿元；2022年3月疫情出现反复，使本就疲弱未稳的需求进一步下滑，4月新增信贷大幅下滑至6454亿元，创近期新低。经济也在4月、5月持续大幅下滑，随即5月央行召开座谈会，指出“受国内外超预期因素影响，近期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要“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工具，从扩增量、稳存量两方面发力”。随后，短期信贷在6月份大幅增加，新增贷款达到2.81万亿元，同比多增达6900亿元，创2020年3月以来的高点。

在倪军看来，考虑到信贷需求和内生资本约束，后续信贷趋势更多需要关注经济内生信贷需求恢复速度以及财政端派生的信用需求额度。

杨业伟认为，本次座谈会后信贷能否继续扩张有待继续观察。一方面，相较于前三次座谈会时的经济形势，目前地产融资需求更弱，并且由于政府债券进入空窗期，财政资金配套弹性更低；另一方面，在今年初、5～6月连续推动银行投放信贷之后，银行储备项目数量存在下降可能，进一步投放空间或也有所压缩。本次座谈会后存在信贷扩张弹性下降可能。因而短期信贷小幅改善可能带来利率震荡，但总体并不会趋势性回升。